

易地扶贫搬迁视角下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基于昭通市靖安新区安置点调研分析

阳年年¹

(云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阶段,易地扶贫搬迁依然是最为行之有效的精准脱贫途径之一。基于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易地扶贫安置点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对搬迁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多层次分析,并针对扶贫搬迁农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提出解决路径。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生活结构 农民市民化 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7; D632.4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扶贫搬迁农民或陷“市民化困扰”

值此全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交替关键期,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笔者于2020年1月同云南农村干部学院一行前往云南省昭通市进行实地调研,其中特别走访调研了靖安新区的搬迁安置工作,所获颇丰。笔者认为靖安新区易地扶贫搬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政府促使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因此笔者在本文所探讨的农民市民化正是特指由于政府特殊政策(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导致的农民成为市民化的被动接受者以及集体土地的集体使用从而使农民整体向市民的转变这样一个现象。

靖安新区搬迁安置点位于昭通市昭阳区,总共涉及搬迁安置昭阳、大关、彝良、永善、镇雄、盐津6个县(区)、30个贫困乡镇、194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134个)、9256户40549人(卡户6976户31160人,随迁户2280户9389人,劳动力21724人),这是一个庞大的跨县域搬迁安置工程。靖安安置区占地面积145.2hm²,总投资43.41亿元,规划建设安置房91.46万m²,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设施8.33万m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院0.44万m²,地下车库21.8万m²,商业、社区用房、集贸市场等8.76万m²,规划配套设施基本按照小城镇的标准完全覆盖。

搬迁安置点共规划为6个社区(惠民社区、思源社区、福兴社区、康庄社区、合顺社区、滨江社区),截止到2020年1月已经搬迁完成了其中3个社区。目前新区围绕搬迁后生计问题,已经推动新区自主创业一批(4户),带动大棚蔬菜基地就业一批(50余人),带动食用菌基地就业一批(700余人),推动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批(400余人)以及带动扶贫车间就业和推动外出务工输出一批(1万余人)。当前,共已转移就业20562人,就业率89.94%,未转移就业2299人,占搬迁劳动力总数10%。靖安新区目前可提供就业岗位6821个(农林产业类岗位2141个,扶贫车间岗位3000个,公益性岗位1210个)。此外,靖安片区(包括靖安镇、青岗岭乡)还将规划蔬菜产业园区733.4hm²,总投资达5.428亿元,计划引进陕西海升、重庆吉之汇、广东亿利绿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届时建成后不仅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岗位,还能进一步带动靖安新区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一举多得。

¹**作者简介:**阳年年(1996-),男,四川彭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基金项目:云南农村干部学院乡村人才振兴课题成果。

同时为了帮助搬迁户顺利过渡，各社区从入住起前期6个月，物业、环卫等费用全免，统一由政府兜底买单，6个月过渡期满后再进行业主收费管理。易迁点采取“社区-片区-楼栋-党员-群众”五级联动的管理模式，综合资源，为入住的农民进行社区生活培训、开展电梯等设施的操作使用讲座等等，同时开展诸如爱心积分换礼品等活动以及定期组织易迁群众健康体检。目前靖安新区易迁点已经建成集教育、民政、社会保障、医疗、户籍业务、市场监管运营、志愿者、就业咨询、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以及劳动维权一体的一站式服务管理中心，以保障尽可能全面地帮助搬迁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走访以及数据分析、推测，当前靖安新区易地扶贫搬迁不可否认取得了暂时的阶段性胜利，然而，无法忽视农民群体搬迁后可能陷入的“市民化困扰”，在这种身份转化过程中，处理不好由此形成的难题是违背了扶贫搬迁的初衷。易地搬迁是扶贫的一种有效途径，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实现小康才是现阶段目的。然而，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易地扶贫搬迁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难题，而不是又把新产生的难题丢给搬迁农民群众。因此这其中还得要预防二次返贫甚至贫困恶性循环的发生，与此同时还需要特别警惕搬迁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以及后续发展暴露出的搬迁群体自身层面的问题和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

1.1 扶贫搬迁农民自身层面诱发的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几乎都是农民群体，因受限于自身条件，搬迁后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1.1.1 心理预期与实际形成落差可能诱发矛盾。

搬迁农民关于需要的完全选择和非完全选择可能导致的矛盾及可能由此衍生出的心理落差。调查发现，搬迁前，农民的生活所需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做饭担心用电或煤气支出多，可以选择用免费的柴火，菜可以田里种，不用特意买等等；搬迁后，做饭水电气等通通必须要支出。因此大多被调查者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模式使得生活费用的开支增加了，尤其对于贫困卡户的这部分群体更是认为生活费用的开支较以往有着很大增加。所以搬迁前在农村没有过多额外支出，搬迁后支出较于以往增长较大，这与他们的心理预期有较大不符，前后的巨大反差就会导致搬迁农民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失望。

1.1.2 角色转变中的不适应引发的蝴蝶效应。

易迁农民从农村一步跨越到城市导致的生活环境快速转变的适应性问题。在农村，农民生活中受到的约束远比在城镇社区里生活要少得多，易迁后的的生活模式使得农民的日常生活结构被迫改变，导致农民因原本生活中多种因素的改变而短时间无法适应新的生活。虽然搬迁使农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但其原本的生活结构也相应被破坏。首先是邻里关系的淡漠。当农民原本的居住地发生迁移，原先存在及维持的邻里关系遭到破坏，至此旧的邻里关系开始解体，新的邻里关系则迫切需要开始重新建立，但是新的关系网却又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据了解，搬迁后的农民一段时期内会因周围不再是曾经熟悉的邻里以及大脑长期形成的固有的刻板印象而不适应新关系。其次是社区认同缺失。在农村社会中，农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地域归属感强。但居住地一经迁移，原有的农村社会认同无法作用到城镇社区认同上。虽然搬迁群体能够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区认同，但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大量精力。最后是长时间习惯了的恶习陋习与新规范新约束的激烈碰撞。大多数农民思想保守，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低，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不乏有人沾染恶习陋习，且由于长期在农村缺乏特别的规范约束，渐渐形成一种不良好的个人习惯作风，沾染的人成群必然造成农村社会生活风气不良，而这其中恶习陋习那一套也随之被带来了，这与城市化形成“对抗”，必然会产生一场关乎思想文化的斗争，同时这也成为了阻碍农民市民化的一大障碍。

1.2 社会-现实层面导致的问题

有规模的农民扶贫搬迁，通常面临较大的“安置”压力，这里的“安置”不仅仅只是新的住房安置，更涉及到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安置”问题。

1.2.1 生计问题：

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发生改变。搬迁户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激烈。搬迁户几乎都是贫困农民群体，经济来源单一，原本不仅有政府兜底救助，还有部分务农获取的稳定收入。现在离开种了大半辈子的土地，除开政府低保政策兜底外，由于农民本身缺乏就业技能，加之在老一辈人眼里，务工甚至不如务农稳定，村民从农村一下过渡到城市，相比之下水电气、物业等等每月都需要额外支出，无疑是加重了搬迁户，尤其是贫困卡户的生活支出，使得搬迁安置的农民生活成本被增加。

1.2.2 生活问题：

配套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需要时间过渡。农民因搬迁市民化以后，居住环境确实得到改善，但并不就代表这些搬迁户甚至贫困卡户的生活美满了。因为他们远远未完成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到市民的过渡和转化，其中仅仅是市民待遇和应享的社会成果就需要花时间来解决，譬如户口、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等等，而这些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转移的，整个转变过程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可能解决得了的。

2 路径选择：农民市民化“困扰”出路

针对以上扶贫搬迁农民市民化有可能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笔者认为大致可以从这些方面考虑出路：

2.1 努力完善搬迁农民的生活保障

要做好群众工作，切实考虑搬迁后续事宜，打消搬迁群众生活上的顾虑，保障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头戏”。采取“七步走”让易迁群众安心放心：一是搬迁后宅基地划归集体，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利用发展经济类作物产业；二是加大技能培训和就业力度，目前社区尚未完全完成搬迁，未来还会有诸多贫困群众面临就业问题；三是配套易迁点产业项目，助推脱贫，特别是可以引进企业入驻、搭建就业平台，就近吸纳和安排易迁点未就业劳动力就业；四是推进捆绑发展，积极探索发展“党支部+社区+公司”和“龙头企业+基地+支部+合作社+贫困群众”等模式，促其健全成熟，确保脱贫成果巩固和提升；五是开发公益岗位，新增社区环卫工、安保员、水管员等公益岗位，就地解决一批人就业；六是实施资产收益，可配套建设专门的经营性门面由社区统一经营管理；七是落实政策保障，加快落实户口转移、做好低保、医保、社保等的有效衔接，每月最低标准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归根到底，重点还是要扶智扶志，不以搬迁安置为完成目标，还要多渠道多方式解决群众增收是关键，保障搬迁群众生活需要，真正实现“断穷根”，避免二次贫困造成贫困恶性循环，真正使搬迁群众不会因搬迁后续问题犯愁，不再因生活犯困。

2.2 做好对搬迁农民的管理服务

对从大山来到城市的“一步跨越”，对故土怀念以及对未来生活不适应等影响下，要做实做细管理服务工作，增强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就要建立成熟长效的机关联系支部、支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三联系”机制，机关党员和社区党员直接联系易迁群众，确保搬迁户都有党员直接联系和负责，让搬迁群众在党员带头引领下快速融入社区生活。

同时创新实现社区网格化精细管理，优先选拔党员、干部或者热心公益的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各个层面负责人，早日形成较为成熟长效的“社区-片区-楼栋-党员-群众”五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并积极探索“片区长+楼栋长+警务长”三长负责制管理模式。助力搬迁户早日过渡和适应新生活，获得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2.3 从文化和生活习俗上改变搬迁农民旧思想观念

易地搬迁不仅是挪穷窝，更是换思想，要让易迁贫困群众转观念，树立新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就要对社区居民定期开展科学合理的思想培训，组织必要的教育学习，使群众焕发新面貌，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就要求社区党支部及组织等要切实发挥好引导作用，教育引导群众改变陋习、弘扬新风，融入城镇先进文明。整个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完全可以由社区党员同志牵头组成志愿服务队，发挥志愿服务的精神，进一步融入社区、融入群众，持之以恒，耐心引导，攻克难关，帮助贫困搬迁户展新颜。

参考文献：

- [1]文军.“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7-11+152.
- [2]王春蕊.易地扶贫搬迁困境及破解对策[J].河北学刊，2018(05):146-151.
- [3]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J].河北学刊，2013(04):86-93.
- [4]刘天旭，郑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被动市民化的历史演变[J].农村经济，2012(12):113-116.
- [5]邹英，向德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市民化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2):75-80.
- [6]贺东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对策探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07):18-20.
- [7]魏婷，时匡.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J].农业经济，2019(12):50-51.